

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 生育意愿的城市差异

侯慧丽

摘要 城镇化对降低人口生育意愿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正处于低生育水平时期，人口的生育意愿突出地表现为是否生育二孩。对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分析发现：城镇化降低人口的生育意愿主要表现在城镇化过程中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下降；更重要的是，城市规模不同，其流入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程度亦存在差异；流入人口的户籍性质、定居意愿和生育服务可获得性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流入人口的传统生育文化、社会融合程度和城市的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导致不同规模等级城市间生育意愿差异的主要社会因素。中国的城镇化具有流动人口倾向于向大城市聚集的特征，这进一步加剧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速度。因此，不能忽视城镇化路径选择对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影响。

关键词 城镇化 生育意愿 流动人口 城市规模

[中图分类号] C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851X (2017) 01 - 0060 - 13

一、引言

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郭志刚，2008）。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育龄妇女的理想生育子女数就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平均理想子女数稳定在1.6~1.8之间（侯佳伟等，2014）。即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生育意愿也未有明显提升。这也验证了此前的一个观点，即1990年之后开始的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只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等现代化因素有关（王丰，2010）。

【作者简介】侯慧丽（1971-），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邮政编码：100028。
致谢：感谢评审专家匿名评审，当然文责自负。

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行为逐渐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中城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据测算，近3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使全国总和生育率下降0.25，占生育率总体下降幅度的21%。在当前的低生育水平条件下，城镇化发展仍然起着稳定全国生育水平的作用，在未来中国生育率的变动中，预计仍有70%以上是由城镇化发展所引起的，城镇化的持续高速发展将进一步降低全国的生育水平（Guo et al., 2013）。而城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开始的，城镇化使育龄妇女在当期生育的概率下降、理想子女数降低，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生育意愿（倪国华、蔡昉，2015）。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中国意愿生育水平呈显著下降趋势，城镇化水平提高5%、10%、20%和30%，将分别导致意愿生育水平下降到1.83、1.82、1.81和1.80，而且城镇化等因素还在使低生育意愿人群不断增加（王军、王广州，2013）。

我国的城镇化具有速度快、不均衡等鲜明特点。1978~2013年，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显示出城市在人口规模和地区上发展的不均衡。全国7个超大城市中有5个属于这三大城市群。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大，使原来以城乡关系为主的二元结构动摇。从城乡结构看，逐渐出现了城乡之间、城镇之间和城市内部之间的三重二元结构（魏后凯，2014）；从社会分层结构看，日益分化成以“城-乡”和“大城市-中小城市”为维度的分层结构（李强、王昊，2014）。总之，无论从何种角度，城镇化意味着城乡关系和城际关系两方面的变化。城镇化促进了城乡关系的变化，还使得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日渐显现，特大城市发展迅速，中小城市发展相对缓慢（魏后凯，2014），因此，我国的城镇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产生的城乡关系的变化，还包含城际关系的变化等多重含义。

城镇化对生育意愿的降低通过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传播扩散以及生育行为的模仿而产生（戈朝霞，2015）。人口流动是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态势的主导因素（顾宝昌，2013），对不同规模的城市而言，影响其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存在差异，意味着不同的城市特征带来的生育水平可能不同。探索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生育意愿差异，对准确判断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国务院最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①分析不同的城市规模下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差异，并探讨引发这种生育意愿差异的主导因素。

^① 根据国务院最新城市划分标准，将城市按照主城区人口规模划分为50万（小），50万-100万（中），100万-500万（大），500万-1000万（特大），1000万以上（超大）五类。详见：国发〔2014〕51号《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1/20/content_9225.htm〔2016-12-20〕。

二、相关文献与研究思路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很多,人口学因素包括年龄(Liefbroer, 2009)、婚姻状况(Lacovou, 2010)、性别、生育经历等,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教育、社会规范、职业、收入等(Heiland, 2008)。城镇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正是由于城市流动人口在这些方面的变化而引起的。

西方人口学者在研究城镇化与生育意愿的关系时,将城镇化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城乡之间生育率的差异,研究发现城市的生育水平低于农村的生育水平,并且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种族之间都存在着这种城乡差异(Jaffe, 1942)。城镇化促使农民从农业领域转移至非农业领域,进城农民携带的未成年子女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劳动参与率下降,孩子养育成本增加,从而生育意愿下降。城镇化使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家庭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接受程度更高,这导致城市的生育率低于农村(Nag, 1981)。此外,较好的生育控制技术以及城市人口因追求事业而拥有较低的生育意愿,都是导致城市生育水平低于农村的原因。在中国,小城市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不如大城市严格,小城市人口生育率比大城市高也是事实存在的(Henderson, 2005)。

对城镇化与生育意愿关系的相关研究不仅证明了城镇化是降低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深入分析了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的各种可能因素。但是,这些研究在当前中国城镇化背景下仍然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为其前提假设没有考虑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即把所有城市都假设成具有相同的特征,忽视了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导致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程度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对城市进行分类研究,以反映流入地城市的不同特征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差异。

由于城镇化主要通过社会经济因素降低生育意愿,因此本文重点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而将人口学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生育意愿存在着城乡差异,因此户籍性质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代表着人口流动前的身份所承载的不同的传统生育文化,非农业户籍人口所拥有的传统生育文化要弱于农业户籍人口。传统生育文化是人口流动前的一种状态,人口流动到城市之后面临着融入城市的问题,融入较好的流动人口接受当地城市观念更快,从而会导致其生育意愿发生变化。本文采用是否愿意长期定居在目前所在城市作为反映城市融入程度的变量,愿意长期定居的流动人口与城市的融合程度高,其生育意愿特征更接近本地城市人口。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成本,本文将家庭月收入作为表征养育孩子经济提供能力的指标。已有研究也发现对生育政策和生育技术的接受会改变生育意愿,因此本文也将生育服务的提供作为影响生育意愿的变量之一。

本文主要检验的是流动人口的户籍性质、定居意愿、家庭月收入 and 生育服务四个变量,它们分别代表了传统生育文化、社会融入程度、养育孩子的经济提供能力和

生育服务的供给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此处，一个暗含的假设就是这四个方面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存在差异，较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与较小城市的流动人口在这四个方面有所不同，从而造成了不同规模城市之间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差异。

三、数据和变量

本文采用2014年5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管理司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流动人口监测所采集到的数据，该数据是目前中国流动人口调查中规模最大且最有代表性的资料。由于人口的频繁流动，一般的调查难以获得比较完整的流动人口抽样框，随着流动人口不断地融入城市，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居住点减少，在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出现了以流动人口为抽样框的调查，但仅仅局限于一个地区的层面，还没有全国性的数据库。而此调查是在工作系统内进行的全国性调查，得到的是流动人口的实时监测数据，能够全面及时地反映流动人口的动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流动人口监测的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调查时期年龄为15~59周岁的流动人口。数据库中流动人口样本有201000人。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剔除了因为婚姻、学习、探亲等原因而流动的人口，只选取了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包括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由于本文重点探讨生育二孩的意愿，因此选择了数据库样本中处于育龄、已婚有配偶并且目前只有一个孩子的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得到的样本有67389人。

本文采用二孩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流动人口检测的问卷中“是否打算再生育一个孩子”有四个选择项：“是”、“否”、“没想好”和“现孕”，本文将“是”和“现孕”合并为一类“是”，最终得到三个选择项：“是”、“没想好”和“否”。由于这三个选项之间具有序次性，因此本文采用序次Logistics回归，因变量的选项定义为：“是”=1，“没想好”=2，“否”=3。

在人口学研究中，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很多。一般的人口学变量包括被访者年龄、婚姻、孩子年龄、民族、性别、一孩性别、被访者是否独生等。文献研究显示，初婚年龄的延迟是发展中国家降低生育水平的主要途径（Bongaarts, 1999），但是初婚年龄对生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孩的生育上，对二孩生育的影响较小，所以本文用初育年龄替代初婚年龄。本文考虑的社会经济变量包括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户籍性质、定居意愿以及流入地城市提供的生育服务等。样本中各变量的分布见表1。

样本中流动人口平均家庭月收入为6512元，平均年龄为34.5岁。从生育意愿来看，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人口超过一半，达到54.1%，明确再生育的人口只占12.7%，没有想好的人口占比比较大。从定居意愿来看，超过60%的流动人口想长期居住在目前所在城市，因此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研究必然要考虑其定居意愿。

表1 样本中主要变量的分布

变量	频数(个)	百分比(%)	变量	频数(个)	百分比(%)
城市规模			教育程度		
超大城市	12419	18.4	小学及以下	6467	9.6
特大城市	6961	10.3	初中	37246	55.3
大城市	32662	48.5	高中	14401	21.4
中等城市	6614	9.8	大学专科	6040	9.0
小城市	8733	13.0	大学本科	2964	4.4
生育意愿			研究生	271	.4
生育二孩	8540	12.7	民族		
没想好	22367	33.2	汉族	63816	94.7
不生育二孩	36482	54.1	少数民族	3573	5.3
户籍性质			定居意愿		
农业户口	54889	81.5	离开	7969	11.8
非农业户口	12500	18.5	没想好	18107	26.9
婚姻状况			不离开	41313	61.3
初婚	66629	98.9	被访者身份属性		
再婚	760	1.1	夫妻都非独生子女	57899	86.2
性别			夫妻都是独生子女	2417	3.6
女性	25512	37.9	仅女方是独生子女	3025	4.5
男性	41877	62.1	仅男方是独生子女	3838	5.7
家庭月收入	6512 元		平均年龄	34.5 岁	

N = 67389

根据国家城市规模划分的最新标准, 本文将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5 类。我国城市具有行政级别特性, 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不同级别的城市的权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各有不同, 但是在城镇化过程中, 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市行政级别的分类。一些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因为制造业的发展, 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 迅速发展成为大城市; 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出现了衰落。因此, 单纯从行政级别上来划分城市并不足以完全体现城市特点。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 而市场是人口流动的调节器, 因此以人口规模来划分城市, 能够比较好地代表城市的发展现状。不同规模城市的变量分布见表 2。

从表 2 可以初步观察到影响生育意愿的各因素在城市间的差异。在生育意愿方面, 大致表现为城市规模越大, 其流动人口不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越高, 城市规模越小, 流动人口生育二孩的比例越高, 其中特大城市流动人口不愿意生育二孩的比例最高。在定居意愿方面, 愿意定居在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比例最高, 高达 65.2%, 特大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差别不大。生育服务主要指是否在流入地接受过生殖和避孕的健康教育, 从描述性分布看, 城市间的生育服务供给差别不大, 小城市稍高于其他城市。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分布呈现出城市规模越大,

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越高的特点。在年龄分布上，超大城市的育龄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比其他城市稍高，但是初育年龄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当然，这只是简单的描述性分析，还需要通过在控制相关变量之后观察其净效应并对生育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表 2 不同规模城市中流动人口各变量的分布

	生育意愿 (%)			定居意愿 (%)			生育服务 (%)		
	是	否	没想好	离开	没想好	不离开	有	无	
超大城市	10.9	54.3	34.8	10.2	24.7	65.2	58.1	41.9	
特大城市	10.0	59.1	30.9	12.0	29.0	59.0	57.6	42.4	
大城市	13.4	53.4	33.2	12.1	27.2	60.6	60.0	40.0	
中等城市	14.1	53.3	32.6	12.1	26.0	62.0	59.3	40.7	
小城市	13.6	53.2	33.2	12.7	27.6	59.7	63.9	36.1	
合计	12.7	54.1	33.2	11.8	26.9	61.3	59.9	40.1	
	受教育程度 (%)						家庭月收入 (元)	初育年龄 (周岁)	年龄 (周岁)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超大城市	6.2	49.1	20.9	12.1	10.4	1.3	8262.57	26.02	34.23
特大城市	8.8	54.7	22.9	9.9	3.4	0.3	6591.53	25.30	34.45
大城市	8.8	57.2	22.1	8.5	3.2	0.2	6149.01	25.46	34.29
中等城市	10.3	57.0	21.6	7.8	3.1	0.2	5703.09	25.51	34.84
小城市	17.5	56.0	17.9	6.2	2.2	0.1	5927.61	25.36	35.44
合计	9.6	55.3	21.4	9.0	4.4	0.4	6511.78	25.54	34.50

四、回归分析

根据因变量性质的不同，Logistics 回归模型可分为二分、序次和多项 Logistics 回归，其基本原理都相同，表达式为：

$$f(p) = \frac{e^p}{1 + e^p} = \frac{e^{(\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k x_k)}}{1 + e^{(\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k x_k)}} \quad (1)$$

Logistics 模型的总体拟合优度检验常用的检验参数为对数似然函数值 (log likelihood, $-2LL$)，即拟合模型的对数似然值。该数值的绝对值越小越好。整体模型的拟合度检验也可推及两个自变量的嵌套模型，将简化模型的对数似然值与完整模型的对数似然值相减的结果与相应自由度的卡方分布临界值进行对照，就可判断哪个模型更适合，卡方为其检验统计量，Prob 为显著性。伪 R^2 (pseudo R^2)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检验模型好坏的作用，但对于非线性的 Logistics 回归模型，并没有一个完全等同于线性回归模型 R^2 这样的参数。与线性回归分析中 R^2 的意义不完全相同，伪 R^2 统计量有多种，本文选取 Cox and Snell's R^2 作为模型检验的一个参考。

在序次 Logistics 回归模型中, 如果系数为正值, 那么与参照组相比, 结果倾向于因变量设置数值较大的选项; 如果系数为负值, 则与参照组相比, 结果倾向于因变量数值较小的选项。具体到本文, 当系数为正值, 则结果更倾向于不生育二孩, 且数值越大, 倾向性越强; 如果系数为负值, 则结果更倾向于生育二孩, 且数值越小, 生育二孩的意愿越强烈。表 3 是分城市规模类型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序次 Logistics 回归结果。

表 3 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序次 Logistics 回归分析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β	S. E.	β	S. E.	β	S. E.	β	S. E.	β	S. E.
阈值 1	1.330 *	.560	.223	.894	1.953 ***	.407	.185	.859	.784	.841
阈值 2	3.559 ***	.561	2.345 **	.895	3.981 ***	.408	2.154 *	.859	2.842 **	.842
孩子年龄	.064 ***	.016	.077 ***	.022	.074 ***	.010	.099 ***	.022	.111 ***	.019
孩子年龄平方	.003 ***	.001	.004 ***	.001	.003 ***	.000	.001	.001	.000	.001
初育年龄	.067 ***	.013	.069 ***	.017	.063 ***	.007	.054 **	.017	.055 ***	.014
家庭月收入对数	-.043	.037	-.108	.057	-.031	.024	-.171 **	.051	-.068	.040
被访者年龄(29岁以下为参照组)										
30~34岁	-.121	.077	-.041	.106	-.107	.047	-.244 *	.106	-.010	.096
35~39岁	.020	.131	.030	.177	.007	.079	-.057	.179	.172	.157
40~44岁	.280	.191	-.139	.255	.010	.114	.019	.255	.224	.222
45~49岁	.254	.267	-.421	.351	-.045	.155	.303	.342	.320	.295
民族(少数民族为参照组)										
汉族	.192	.116	.119	.148	.469 ***	.048	.520 ***	.113	.587 ***	.069
性别(女性为参照组)										
男性	.241 ***	.039	.169 **	.054	.145 ***	.025	.295 ***	.055	.204 ***	.048
婚姻(再婚为参照组)										
初婚	.507 **	.175	.082	.354	.233 *	.114	.325	.222	.307	.205
一孩性别(女孩为参照组)										
男孩	.482 ***	.038	.481 ***	.052	.776 ***	.023	.702 ***	.052	.354 ***	.045
夫妻生育身份(男方单独为参照组)										
双方非独	.833 ***	.070	.743 ***	.093	.586 ***	.049	.596 ***	.104	.306 **	.099
女方独生	.025	.094	.090	.132	-.020	.072	.289	.156	.119	.140
双独	.128	.100	.446 **	.143	.179 *	.079	.277	.171	.094	.146
教育程度(研究生为参照组)										

续表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β	S. E.	β	S. E.	β	S. E.	β	S. E.	β	S. E.
小学及以下	.190	.193	-.002	.420	.564 *	.256	.010	.514	.062	.614
初中	.066	.170	.015	.407	.500 *	.252	-.182	.505	-.024	.611
高中	.122	.169	-.076	.406	.495 *	.252	-.081	.506	-.158	.612
大学专科	.160	.167	.123	.407	.566 *	.253	-.153	.508	-.152	.614
大学本科	.144	.166	.220	.418	.547 *	.257	.011	.519	-.334	.625
户籍性质(非农业 户籍为参照组)										
农业户籍	-.325 ***	.054	-.310 ***	.079	-.293 ***	.035	-.239 **	.076	-.345 ***	.066
生育服务(没有 为参照组)										
有生育服务	.129 ***	.038	.114 *	.053	.016	.024	-.036	.053	.036	.047
定居意愿(定居 为参照组)										
不定居	-.248 ***	.064	-.115	.083	-.195 ***	.036	-.316 ***	.080	-.181 **	.069
没想好	-.372 ***	.046	-.329 ***	.059	-.317 ***	.027	-.314 ***	.059	-.497 ***	.051
N	12395		6946		32586		6599		8653	
-2LL	20242.789		10905.324		53898.062		11278.074		14592.042	
卡方	2833.163		1590.089		7593.487		1530.202		2093.283	
P	.000		.000		.000		.000		.000	
pseudo R ²	.204		.205		.208		.207		.215	

注：因变量设置为“生育”=1，“没想好”=2，“不生育”=3；***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5$ 。

从表3可以得到的分析结果如下。

(一) 人口学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往研究表明人口学因素中的夫妻年龄、婚姻状况均影响着生育意愿，但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上述变量的变化均没有引起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变化，并且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均是如此。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政策放开形成的补偿性生育使得一些原本有影响的因素不再起作用。但是一孩的年龄、性别和夫妻的性别、民族以及夫妻的独生身份等因素都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一孩年龄越大，生育二孩的意愿越弱；与男性相比，女性更不愿生育二孩；汉族相比少数民族更不愿生育二孩，初婚的流动人口比起再婚的流动人口更不愿生育二孩；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更强烈，即对男孩的性别偏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被访者家庭中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的比至少有一个是独生子女的明显更不愿意生二孩。以上因素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都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城市规模越大、一孩年龄越大，对生育意愿产生的影响越小；超大城市中流动人口每增加一岁，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可能性提高6%，而小城市则提高11%；超大城市中，初育年龄每提高一岁，不生孩子的意愿提高7%，而小城市则提高6%。

(二) 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变化。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只有在中等城市中显

著,其他规模的城市中收入与生育意愿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关系,总体上收入高低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不大。教育程度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教育程度的差异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只在大城市中显现,在超大、特大和中小城市均未出现生育意愿会随着教育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显著关系。户籍性质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差异在不同类型城市中都存在,基本趋势是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比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更可能生育二孩;在超大城市中,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不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只有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72%,特大城市是73%,大城市是75%,中等城市是79%,小城市却又回到了超大城市的水平。但总体规律是城市规模越大,户籍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越大。生育服务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只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显著,获得生育服务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不生育二孩,这也验证了已有文献中的结论,即城市提供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技术都使得生育率有所下降。随着城市规模的降低,有无生育服务对生育意愿均无显著影响。虽然在描述性分析中,小城市的流动人口得到生育服务的比例要大,但是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发现大城市、中小城市中生育服务的供给与生育意愿并没有相关关系。定居意愿对生育意愿也会产生影响,除了中等城市之外,城市规模越大,不定居的流动人口相比定居的流动人口生育二孩的意愿要强烈。

户籍、生育服务以及定居意愿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影响程度不同,因此每个变量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分布就成为城市特征的指标。从上文分析中可知,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比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生育二孩意愿强烈,那么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是否存在非农业户籍和农业户籍人口分布的不同呢?这两类人口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生育文化,如果非农业户籍人口更可能流入规模大的城市,他们具有的传统生育文化相比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要弱,这种情况将更有利于降低超大、特大城市人口的生育意愿。同样,由于得到生育服务的流动人口比没有得到生育服务的不生二孩的意愿更强烈,那么是否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获得生育服务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导致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比小城市的更低呢?此外,规模较大的城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是否更强、融入程度更高、接受当地城市的观念更深入,从而导致规模较大城市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更低呢?这需要给出进一步的分析。

分别以户籍性质、是否有生育服务和是否长期定居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以户籍和生育服务为因变量的回归采用二分Logistics回归,以定居意愿为因变量的回归采用序次Logistics回归,两者的原理和表达式都相同。在二分Logistics回归中,回归系数 β_1 表示某一自变量改变一个单位时,因变量发生与不发生事件的概率之比的对数变化值。

可以看出,户籍、有无生育服务和定居意愿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都有显著差异,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小城市拥有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可能性比其他规模的城市要大,也就是说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倾向于流向小城市,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倾向于流向大城市。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传统生育文化弱于农业户籍人口,其生育意愿低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流向大城市的概率又高于农业户籍人口,导致了大城市的生育意愿低于小城市。

表 4 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户籍、定居意愿和生育服务的获得概率的差异

	以户籍为因变量			以定居意愿为因变量		以是否有生育服务为因变量		
	β	S. E.	Exp (B)	β	S. E.	β	S. E.	Exp (B)
城市规模(小城市为参照组)								
超大城市	-.187***	.041	.829	.062*	.031	.373***	.030	1.452
特大城市	-.555***	.049	.574	-.096**	.034	.346***	.034	1.414
大城市	-.420***	.036	.657	-.009	.025	.229***	.025	1.258
中等城市	-.287***	.048	.750	.043	.034	.240***	.034	1.271
年龄	.074***	.002	1.077	-.004**	.001	.013***	.001	1.013
流动时间				.135***	.002			
家庭月收入对数	.087***	.022	1.091	.664***	.017	.001	.016	1.001
性别(男性为参照组)								
女性	.181***	.024	1.199	.060***	.017	-.455***	.017	.635
教育程度(以研究生为参照组)								
小学及以下	-4.895***	.208	.007	-.452**	.163	.670***	.136	1.953
初中	-4.020***	.201	.018	-.481**	.161	.498***	.134	1.646
高中	-2.833***	.201	.059	-.366*	.161	.362**	.134	1.437
大专	-1.738***	.201	.176	-.080	.162	.222	.135	1.249
本科	-.884***	.203	.413	-.013	.165	.124	.137	1.132
婚姻(再婚为参照组)								
初婚	-.418***	.096	.658	-.151	.078	.036	.075	1.037
户籍性质(非农为参照组)								
农业				-.088***	.025	-.057*	.023	.944
居留意愿								
不定居	-.097*	.038	.908			.241***	.025	1.272
没想好	-.122***	.028	.885			.265***	.019	1.304
参保参考(没有参保为参照组)								
参保	.755***	.026	2.128	.376***	.023			
不清楚	.145	.098	1.156	-.356***	.060			
流动方式(省内流动为参照组)								
省外流动				-.543***	.017			
夫妻生育身份(男方单独为参照组)								
双方非独						-.085*	.035	.919
女方单独						-.061	.050	.941
双独						-.039	.054	.961
常量	-1.150	.310	.317			-1.388***	.219	.250

续表

	以户籍为因变量			以定居意愿为因变量		以是否有生育服务为因变量		
	β	S. E.	Exp (B)	β	S. E.	β	S. E.	Exp (B)
阈值 1				3.465***	.236			
阈值 2				5.066***	.236			
-2LL	50093.963			105706.298		89223.325		
N	67389			67383		67389		
卡方	14545.428			8386.915		1557.562		
P	.000			.000		.000		
pseudo R ²	.194			.117		.023		

注：户籍：“农业”=1，“非农业”=0；定居意愿：“不定居”=1，“没想好”=2，“定居”=3；生育服务：“有”=1，“无”=0；***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5$ 。

不同规模城市的定居意愿也显著不同，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的可能性要大于小城市，但是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相比小城市更倾向于“没想好”或者“不定居”，也就是定居的可能性要小于小城市，而大城市、中等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差异则不显著。定居的流动人口比不定居的具有更低的生育意愿，超大城市流动人口较高概率的定居意愿容易导致超大城市具有更低的生育意愿。超大城市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定居说明流动人口对超大城市融入度更强，更能接受超大城市本地的生育文化，其不生二孩的意愿更强。而定居在小城市的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较弱，对城市生育文化的接受程度较低，相对于规模较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较高。因此，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高于小城市是造成城市间生育意愿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生育服务的获得来看，虽然在描述性分析中，不同规模城市之间流动人口获得生育服务的差异不大。但是在控制相关变量后，研究发现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越容易获得生育服务，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生育服务的概率分别是小城市的1.45、1.41、1.26和1.27倍。由于获得生育服务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比没有获得生育服务的要低，从而导致生育服务提供概率高的超大、特大城市的生育意愿低于生育服务提供概率低的小城市。

五、结论与讨论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定居在城市的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将会对全国的生育水平产生很大影响。城镇化降低了人口的生育意愿，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生育意愿的变化，还表现在城市之间生育意愿的差异。通过对流入到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的生育意愿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够更为准确地判断和评估中国人口发展的趋势。

通过对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二孩政策全面实施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并不影

响二孩生育意愿，并且在不同规模城市中都是相同的结果。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被政策抑制的生育需求，就生育年龄范围内的人口而言，年龄大小、学历高低、收入多少并未明显影响其生育意愿。不仅如此，从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看，夫妻至少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比夫妻都不是独生子女的要高，这也体现了人口生育补偿性的需求。

第二，传统生育文化、社会融入程度及城市的计划生育公共服务提供水平是导致城市间生育意愿差异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户籍、定居意愿及城市生育服务的供给等社会经济变量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不同导致了城市间生育意愿的差异。传统生育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和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显著差异。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受传统生育文化影响更深，生育意愿也更高，且更可能流动到小城市，因此传统生育文化通过流动人口户籍身份在城市间的不同分布影响了城市的生育意愿，形成了不同规模城市间生育意愿的差异。在相同条件下，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更强，意味着与城市的融合程度更高，接受城市的生育观念更深入。

由于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不同，选择不同的城镇化路径，未来生育水平的结果可能会不同。如果以发展大城市为主，大量涌入超大、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生育意愿将会很快降低，具体表现为不愿生育二孩的人口大量增加。如果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那么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将不会像发展大城市那样下降太快，生育意愿相对更高。

参考文献

(美)布赖恩·贝利(2010):《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第6~7页。

戈朝霞(2015):《中国的城镇化如何影响生育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研究》，《人口学刊》第3期，第88~101页。

顾宝昌(2013):《中国进入由人口迁移和流动主导人口态势的时期》，《中国社会科学报》8月2日第8版。

郭志刚(2008):《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第4期，第1~12页。

侯佳伟、黄四林、辛自强等(2014):《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78~97页。

李强、王昊(2014):《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第174~187页。

倪国华、蔡昉(2015):《膨胀还是坍塌：城镇化对育龄妇女生育规划的影响研究》，《中国软科学》第6期，第45~55页。

童玉芬、王莹莹(2015):《中国流动人口的选择：为何北上广如此受青睐?——基于个体成本收益分析》，《人口研究》2015年第4期，第49~56页。

王丰(2010):《全球化环境中的世界人口与中国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第6期，第70~80页。

王军、王广州(2013):《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估计》，《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第26~35页。

魏后凯 (2014):《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两极化倾向于规模格局重构》,《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第18~30页。

张耀军、岑曾 (2014):《中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与省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第54~71页。

Bongaarts J. (1999), "The Fertility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Timing of Childbear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Population Council Working Paper*, No. 120.

Guo Z., Z. Wu, M. S. Christoph and S. Li (2013),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hina's Fertility",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1(3), pp. 417-434.

Heiland F., A. Prskawetz and W. C. Sanderson (2008), "Are Individuals' Desired Family Size Stable? Evidence from West German Panel Data", *Europe Journal of Population*, 24(2), pp. 129-156.

Henderson J. V., R. L. John and S. Choi (2005), "Growth of China's Medium-Size Cities [with Comments]",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pp. 263-303.

Jaffe A. J. (1942), "Urbanization and Fert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8(1), pp. 48-60.

Lacovou M. and A. J. Skew (2010), "Household Structure in the EU", in Atkinson, B. and E. Marlier (eds.),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Europe*,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pp. 79-100.

Liefbroer A. C. (2009), "Changes in Family Size Intentions across Young Adulthood: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5(4), pp. 363-386.

Nag M. (1981), "Modern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Fertility: The Indian Scene",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er quarterly*, 8(3/4), pp. 235-247.

The Diversities of Migrants' Fertility Intention Among the Cities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HOU Hui-li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a key factor in lowering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in modern society. The changes of the migrants' fertility intention show the dynamic of urbanization in lowering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Basic on the migrants' data in China, it has been found that migrants' fertility intention is different among the different scale cities, the bigger the city is, the lower migrants' fertility intention will be maintained. The dynamics of urbanization in lowering fertility intention exist in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ities besid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region. The hukou registers,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fertility public service supplying are the factors exiting in different cities, which leads to the diversities among the different sized citie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fertility intention; migrants; urban scale

责任编辑:丛晓男